

中國現當代文化語境中的白璧德⁺

楊揚^{*}

討論白璧德的目的地是希望在方法論上有所反省。當我們將「文化保守主義」的桂冠——無論是貶義的或褒義的——置於白璧德頭上的時候，人們應該考慮一下，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準確。憑什麼我們就認定白璧德是「文化保守主義」而不是「文化激進主義」或是其他什麼主義？

緣起於二〇〇五年我作為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到哈佛大學研究一年，因為偶然的原因，見到了保存完好的白璧德檔案，該檔案從材料目錄看，非常龐大，大概有三十多個 Boxes，材料的多寡當然不是我們判斷白璧德是不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一個事實依據，但從中我沒有看到白璧德同時代有任何人或任何文章指稱他是「文化保守主義」，這一概念應該是後人加

給他的，在中國大陸是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學的樂黛雲教授的文章〈世界文化對話中的中國現代保守主義——兼論《學衡》雜誌〉最早使用——儘管是善意的並且是積極肯定的——，但在我看來，文章仍沒有將白璧德思想觀點的來源及針對的問題對象說清楚。後來很多研究文章更是在思想史層面上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這樣的發揮，與白璧德本人的言說已經沒有太大的關係了，白璧德不會在意激進或保守、白人或黑人、男性或女性這些當代西方文化語境中才有的問題，他的興趣是基於一位文學教授的職業理想，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他在哈佛大學教學過程中遭遇到的種種問題而引發的個人思考。所以，以哲學家的諸種範疇來要求白璧德的「新人文主

⁺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本院訪問學者學術交流會所發表之論文摘要。

^{*}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代思想研究所研究員。

義」理論的完整性，並將之與杜威的實證主義等加以對比，實在是有點南轅北轍了。

白璧德宣導「新人文主義」的初衷之一，是與他長期接受哈佛大學的人文教育傳統有關（他如果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或其他大學讀書、教學，情況就有可能不一樣），他在哈佛接受大學教育，畢業後到法國學習梵文和巴厘文。回美國後在一所學院教書。一八九四年進入哈佛大學教書後，白璧德教授法語和法國文學。在他任教期間，恰逢哈佛大學實行課制改革，被視為哈佛大學歷史上擔任校長時間最長的艾略特校長，為適應當時美國社會工業化發展的需要，推行自由選課制，強化以實用為特色的知識教育。這場改革的結果，從積極方面看，是鼓勵學以致用，大學與社會需求掛鉤，但在消極方面，是學校和學生急功近利，缺乏深厚的理論學習興趣。一個最普遍的現象就是選課制推行之後，大學生大都選擇一些容易拿學分並且比較輕鬆的課程學習，以至於一些難度較大的理論課程或教授要求比較嚴格的課程，無人問津。這種教改在哈佛歷史上留下最極端的案例，就是醫學院的畢業生竟然不知道人體內部結構如何，更不會看病、動手術。面對如此現象，繼任校長羅威爾在《哈佛月刊》上撰文批評哈佛的選課制度，並在他任期內重新調整，由原來學生自由選課，改變為學校規定本科生的選課內容必須包括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內容，十六門必修課，有具體的分布，明確兼顧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白璧德作為哈佛這一時期的文學教授，當然對過分強調實用知識的工具理性有一種本能的警覺，這種警覺不像是哲學家的反應，而是一個文學評論家的敏感，他撰寫、出版《文學與美國的大學》一書，強調文學教育作為一種人文教育在美國大學教育中的重要性。當然，較之美國一般的文學教授，白璧德具有更為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學養，——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參考白璧德的

中國學生梁實秋先生的文章。——白璧德這樣的專業身分和知識結構，使得他的批評和理論話語不同於杜威的哲學風格和理論特色。在當時美國，據說白璧德與杜威有過辯論，以白璧德據下風而告終，如果真是如此，這也並不能夠說明白璧德對哈佛教育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所提出的批評沒有積極意義。更何況白璧德的批評與杜威的哲學建構本來就是不同領域不同學科對不同問題的思想反應，沒有必要硬將他們扯到一起。以白璧德所在的哈佛為例，教授之間觀點上各有分歧，但並沒有形成尖銳對立的思想營壘。（照林語堂的說法是比較文學系有一位教授激烈反對白璧德的學說，但這樣的說法的真實性如何需要求證。）可以得到證實的情況是當時哲學系的不少教授，其學術趨向與白璧德是極為接近的，如 Royce、Lanman 及 W. 霍金教授等，他們與杜威的實證主義哲學方式不同，都強調形而上學、宗教哲學以及東方哲學的重要性。中國留學生俞大維、韋卓民、趙元任、瞿世英、賀麟先生等隨霍金教授學習形而上學，陳寅恪、湯用彤先生等隨 Lanman 教授學習梵文，梅光迪、吳宓、張鑫海、梁實秋先生等隨白璧德學習比較文學，這些中國學生的思想趨向上普遍都體現出這一時期哈佛學風的人文傾向，而不獨獨是白璧德一個人以及他門下的中國學生如此「新人文主義」。從上述意義上講，在美國，尤其是哈佛校園的學術氛圍中，正常的學術論爭並沒有導致思想陣營的站隊和個人之間的情感對立，只有後來白璧德學說到了中國的土壤上，才演變成嚴酷的意識形態對壘，以至於出現擁戴杜威實用主義的一派標識自己是「進步」的新文化派，而贊同白璧德「新人文主義」主張的是「守舊」的「學衡派」，甚至從未接觸過白璧德教授作品的胡適、魯迅，也在日記和文章中嘲弄白璧德為「守舊派」。這種將論敵思想學說妖魔化的思想論戰，已經超越了學術探討的一般底線，演

變成意識形態混戰，因此，與白璧德本人的思想學說已經沒有太大的關係了。譬如，胡適反對白璧德以及他的中國學生梅光迪、吳宓等人的思想觀點，但胡適對同樣宣導具有宗教哲學和人文主義思想傾向的哈佛哲學系教授霍金，卻能夠接受，並且成為終身的朋友。一九二八年胡適到哈佛還專門向其問學。而同一時期白璧德也在哈佛，他對中國留學生充滿友善，一般中國學生、學者常常會去他家聚會和拜訪，但偏偏胡適沒有去拜訪。如果胡適見了白璧德，或許他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會有新的理解，就像梁實秋一樣，當初是帶著挑戰的心態去選修白璧德的課程，但一個學期上下來，卻被白璧德的淵博的知識和寬厚的道德胸懷所感染，成為「新人文主義」的終身捍衛者。綜上所述，白璧德的案例只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思想史、學術史上的細節問題，但正是因為很多歷史細節問題沒有弄清楚，所以，我們在大談思想史問題之際，也應該在方法論上給予適當的省思。

